120岁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

本报记者 **张稚丹**

商务始于印书

1897年，夏瑞芳等几位年轻排字工决心自己当老板，于是筹资3750元在上海创办了小型印刷工场——商务印书馆（下简称“商务”）。顾名思义，是印刷书籍的地方。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考证，商务最开始并不以出版为主业。它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本馆专售大小新式活字铜模铅板，精印中西书籍、日期报章……”广学会的很多书是商务代印的，商务还代印创刊于杭州的《译林》，发刊词是林纾写的。

当时，清王朝风雨飘零，众多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知识精英目光投向西方，引入了各种先进技术、机械设备及思想主义，西学渐行。商务创始人敏锐意识到英语教材有市场，于是请人将印度英文教材加上译注，1898年出版了《华英初阶》，初印2000册，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1925年出到第82版，换了封面又出到1938年，可谓第一桶金。当时杭州新办的求是书院用的是它，少年胡适初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的是它，梁漱溟在北京中西小学堂学的也是它。

1901年，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5万元。夏瑞芳请翰林出身、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的张元济入股，并负责编译工作。1902年，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商务，新的出版思路成型，商务完成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转型。

1904年是重要的转折年。商务耗费两年心血编纂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靡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风行近10年，最终发行上千万册。辛亥革命后，商务推出65册的《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重印300多次，售出七八千万本，为清末民初的政治动员、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振鹤说，民国初年有一句话叫“今日之教育操于一二书商之手”，“一”就是商务，“二”就是商务、中华。可见当时商务在教育方面的势力如何之大。

商务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先后创办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杂志，传播近代学术思想。

1914年，商务资本增至150万元，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后代张人凤表示，商务从成立开始，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一开始就找对了办出版的方向。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或者有的时候还领先于社会的潮流。

为中国看世界

自成立以来，商务担当起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它既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普及现代知识，也致力于整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深度介入中国的政治、教育、出版和学术。

1929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收入图书1000种，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大学者。丛书包括《国学基本丛书初集》《汉译世界名著初集》《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工农小丛书》《国学小丛书》《商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以低廉价格出售，使得各地公私团体或图书馆都有能力收藏一套基本丛书，进行系统的知识普及，嘉惠民众。

1915年，商务出版了《辞源》，这是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说：《辞源》的价值可能在于无源词，所收10万条词中有1万条没有书证，如西洋的人名、地名、机关名、事件名等专有名词，外语的音译词，科技词汇、术语等。这些词非常专业地解释了当时需要的术语知识问题，起到了传播新学、沟通新旧学桥梁的作用。

191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回到上海，并进入商务，他向张元济提出编辑高等学术书籍的建议，被采纳。

1931年，《严译名著丛刊》8种风行于世，除赫胥黎的《天演论》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译名《原富》）、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严译名《名学》）和《论自由》（严译名《群己权界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译名《群学肄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译名《法意》）等，几乎每一本都影响巨大。

1939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出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出版；1943年，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导论》出版，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出版。1956年出版的《新华字典》，迄今已发行近6亿本。1978年，商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它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也是无数编辑的常任老师。

120年来，商务共出版5万余种图书，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更是令读者感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胡适当年曾经深有感触的说：“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

商务印书馆早期编辑寿笑天的后人袁明感慨，商务老一辈在他们那个年代为中国看世界。他们自觉地接受时代的提醒，有一种文化自信和底气，中西平衡，是旧学新知的平衡和完美结合。商务印书馆，不只是一家出版社。

从小到大的工具书多来自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

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做出版若不赚钱必定是短命的。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首先是个成功的现代企业，既坚守自家立场，又身段柔软，随时准备吸纳人才和新鲜思路，其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均让人叹为观止。

前文提到的商务创始人夏瑞芳，兼销售、采购、取纸、收账于一身，善于识人，头脑灵敏，胆大心细，性情恳挚，富于冒险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14年被暗杀。

张元济放弃南洋公学校长之位来到一个小作坊，与夏瑞芳相约的条件就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916年，张元济接任总经理，主持、督导商务近60年。他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他大力搜求古今图书，1926年“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29年藏书共达51.8万余册。“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

曾和张元济合编《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的商务元老高梦旦，自觉商务出版物已落后于时代，而自己又不懂外文，1921年，赴北京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主持商务编译。胡适推荐了老师王云五。高梦旦一个月后辞去所长职务，尽心辅佐王云五，还将自己的检字研究草稿交给王云五。王云五最终在1926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立即用于商务出版的字典编排。

王云五，一个读英语夜校出身的学徒工。17岁时以按揭方式买了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将全书通读一遍。18岁任上海同文馆的讲师，成了胡适的老师。担任商务总经理后，他定下了“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将文化与商业融合，主编了媲美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让商务赚了大钱。1932年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他写下“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当年8月1日，商务恢复印刷生产。1937年日军进犯上海，王云五将印务转移到香港、长沙。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上海、香港两地商务的财产尽失，王云五决定将总部迁至重庆。当时重庆分馆只剩13万法币，最多维持一个月，到抗战胜利时，商务账上已有数十亿法币现金。他重新确立总经理负责制，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实施大改革，9个专业部长换掉了7个，引进周建人、竺可桢、郑振铎、顾劼刚、叶圣陶等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激进分子，后来都是学术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他又搞“科学管理法计划”，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被全社视为公敌。这个曾经任政府财务部长、发行“金圆券”的“社会人”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商务裁员之议为员工知悉，发行所共产党员廖陈云（即陈云）发起罢工，郑振铎为“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他的老丈人高梦旦为资方谈判代表之一。翁婿恪守“约法”，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会下相敬如常，如此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一时传为美谈。这种品格和风范，使得商务的工人能够成为延安印刷厂的厂长，使得商务无论多大的逆境都转危为安。

商务印书馆百年商务资源部主任张稷认为，有一种“商务印书馆情结”存在。比如后来出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商务原总编辑陈翰伯说：“我不应该离开商务”。比如陈云，离开商务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故地去看看，“我如果不到上海、不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我这一生。”

商务的魅力在于：一、深度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二、它解决的问题具有根本性价值，是现代教育的最重要发端者、推动者。三、它在涉猎的所有领域中几乎都是冠军，展现了非凡的企业能力和事业高度。四、商务的历史体现了企业的大家风范和作为文化机构的风骨。

张稷认为商务印书馆具有非常强的乌托邦的性质，它的产生就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它和北大一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就是张元济在戊戌变法中所做的，他把以教育救国这个灵魂移植给了商务，商务一直坚持了120年。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说，光将商务定位于“文化机关”远远不够，商务对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高度自觉，对教育现代化的重视和有效实践以及它对现代学术建设的不懈努力与担当，使它具有推动、激励、塑造、牵引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功能。商务可以也应该称作“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

夏瑞芳

张元济

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建成的东方图书馆，号称“东亚第一”。

物我相映 田园情

赵晏彪

乡土文学少有人执著写上几年的，余继聪的乡土题材散文创作，却20年不动摇。在他的《炊烟的味道》（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家乡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令读者情不自禁地忆起家乡的那扇柴门，那条清澈的小溪和那座翠绿山峰以及那缕从各家各户飘过的炊烟。

乡村记忆于“80后”“90后”而言是陌生的、新奇的，抑或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插过队、下过乡的我而言，亲切中透着熟悉，熟悉中藏着回忆，字里行间无不勾起对插队时的种种回忆，挖猪圈时的脏与臭，割麦子时的累与苦，吃红薯时的甜与香，分到自己种的花生时的喜与欢……

写田园生活的作者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都市作者，因某个时期在乡村生活过，以一种怀旧的心态去歌咏、赞美乡村，但不管以俯视还是以仰视的心态，写出的文章常有浮光掠影之感，乡村的人物风情终难“走心”，很少给人带来心灵震颤。另一类是在乡村生活的作者，他们有很多切身的感受要表达，以情绪排解为动因去写所熟悉的乡村，往往因过多关注生存的艰难和不遂心愿的事件，写出的文章就像被捆住了手脚，局限性非常大。

余继聪在乡村生活了19年，直至读大学才离开家乡。田园生活的一什一物、一色一声都烙印在脑海里、流淌在血脉里，又因厚重的文化积淀，淘洗和沉淀了本真的生活，写出纯净、富有农耕文化传统内涵的文字，读起来“走心”“暖心”，让人产生心理共鸣。

凡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最初关注的是田园生活的自然美，轻风、流水、月光都充满诗情画意，但长时间辛苦劳作会使人无暇顾及而感受不到。余继聪的描绘却令人向往。《棕蓑衣》中有段描写：“我像一只披着厚厚羽毛的大鸟、野鸟，站在山林间，站在山坡上，看见一树树野花静悄悄开，一只只野鸟飞飞落落，一条条山溪潺潺而下，我感到很幸福……披着厚厚的棕蓑衣，风雨中，我也感到很温暖，很惬意，任凭我的羊群沐浴清新洁净的雨水。”这与古人所写“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看起来像是跨越了百年的巧合，却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观与自然和谐观。人的心灵感知从古至今都与大自然互为彼此、不可分割。

自然演化的历史，是一部物我相映的历史，从历史走来的一什一物都烙印着文明的足迹。“风喜欢翻阅瓦上的内容，喜欢阅读研究瓦上的一粒粒或者凸起或者凹陷的文字，喜欢推敲瓦上的心事。雨喜欢替瓦擦拭脸上的灰尘。太阳喜欢舔干瓦脸上的泪痕。”（《瓦书》）这里，瓦是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人类的辛勤和智慧，风、雨、太阳对瓦的认同、爱抚，表现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共生共憩的鱼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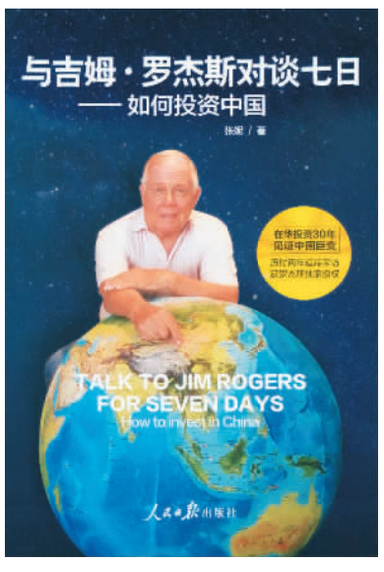
《庄稼在说话》描写雨中的庄稼地，沙沙的响声，随风摇曳的枝叶，这种颇具动感的美在农民心头激起节日般的欢喜。农民可以听懂庄稼的语言，因为彼此是命运的共同体。当人的心灵感应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难分，人才真正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对抗和博弈，共享欢欣和忧伤。

在寻求温饱的年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毁林拓田。但当人们从这片田地收获了果实，大自然狠狠地抽了破坏者一鞭子——山洪冲毁了土地，播种和丰收都不复存在。余继聪在《一块即将死去的地》中明确了这样的认知：人生存的根本要素就掌握在自然的手中，人与自然的博弈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尽管“父亲”采取了各种方法去弥补，最终还是回天无力，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土地消失。在毁林和保林的过程中，作者写出了“我”与“父亲”内心的冲突，情感的落差以及无可挽回的痛惜，令读者反思现实。

余继聪的散文，对乡土文化、田园生活进行了多侧面、立体化解读，表现出深度和广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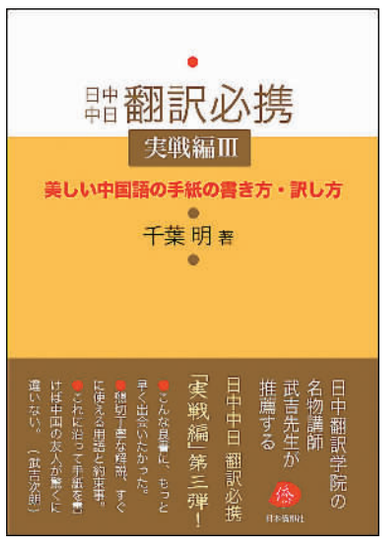
与罗杰斯谈投资中国

人民日报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与吉姆·罗杰斯对谈七日——如何投资中国》，由《环球时报》财经记者张妮历时两年追踪采访撰写而成。吉姆·罗杰斯是国际著名的投资实践家和金融学教授，在众多投资领域有惊人表现。迄今为止，他曾分别于1999年、2005年、2008年、2013年4次投资中国股市，都是在中国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股票涉及的行业是中国未来10年甚至30年内将蓬勃发展的领域，如农业、旅游业等。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卖掉任何一只中国股票。他并不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担忧。他认为，高储蓄率使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可用于投资，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热情，中国有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具有再创辉煌的能力，所以中国前景大好。（毕春月）



《典雅中文书信写作及翻译》

国庆前夕，日本侨报出版社推出了日本外交官千叶明著作《典雅中文书信写作及翻译》。

随着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和中日两国人员往来的增多，中文书信和邮件写作受到重视。该书就提高阅读与写作中国传统书信的能力，正确理解和翻译好中国书信，结合茅盾、鲁迅、蔡元培、李大钊等十数位中国名人所撰写的传统书信，按照请托、感谢、馈赠、邀约、请求、婉辞、致歉、问候、祝贺和吊唁等主题分为10讲，介绍书信鉴赏与写作的专门知识和技巧，可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传统书信的写作要领，提高文化修养。

作者千叶明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工作需要，他对中国的书信文化进行了长期严谨的学习研究。（段跃中）